

一度成为近代中国通往现代之路的主流话语。

但是当国人面对多元性与复杂性并存的西南民族，中国民族的先验认知在与西南民族研究实践结合时全然崩塌，由此引发出对“民族”与“国族”的重新理解。在厘清“国族”不必等同于“民族”后，民族学/人类学者深信“国族”的建构同边疆民族的权利诉求是可以共同推进的，是可以在民族多元而政治一体的前提下达成的。通过“同化”、“开化”或“现代化”的改造，在承认民族差异的前提下同样可以建立统一的“中华民族”国族信念。事实证明，民族学与人类学界的这一先声，最终推动国民政府对“西南民族”部分的政治承认，在宪法中赋予“西南民族”相应的选举权与参政权。<sup>2</sup>

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民族学/人类学者围绕“国族”建构的思考，或被后世批评为轻忽人类学理论，或视之为“以民族学作为大民族主义扩张领域的一种手段”。<sup>3</sup> 这样的批评或许遗忘了当时的历史情境，而有以今人之眼光反观历史的嫌疑。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中国的仁人志士无不奋起以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学/人类学者以其对“他者”研究的先天优势，尝试建构一套知识谱系，以凝聚与汉文化相异的少数民族群。有的学者曾不无感慨地指出，从吴文藻至费孝通，“民族研究家一直没有能够完善地在理论上找到一把解决一体的政治实体的‘中华民族’和多元民族认同与文化之间关系的钥匙”。<sup>4</sup> 回顾学术史，“同化”、“开化”而至“现代化”的“国族”建构模式，或许就是上个世纪民族学/人类学者留给我们的一份答案。

## 【论 文】

### 少数民族知识精英话语权、社会责任及其困境分析<sup>5</sup>

#### ——以内蒙古蒙古族知识精英为例

常 宝<sup>6</sup>

**【摘要】** 知识精英是社会的佼佼者，民众的代表，有其独特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同样，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在民族社会中的功能和责任十分显著，他们的话语体系呈现出独有的内容特征和权力模式。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少数民族知识精英话语体系出现政治的敏感、文化的“俯视”和知识的“异化”等困境，一度疏失其社会责任感和使命。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应在民族社会民众生活、经济文化发展、教育和制度建设中重新发挥应有的功能和神圣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 少数民族知识精英；话语权；社会责任；困境

<sup>1</sup> 念慈：《同化边民非汉化》，《南风》，1949年，第1-2页。

<sup>2</sup> 《国民大会实录》，国民大会秘书处编印，1946年12月。

<sup>3</sup> 陈永龄、王晓义：《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一辑）》，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287页。

<sup>4</sup> 王铭铭：《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7页。

<sup>5</sup> 本文刊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第38-46页。

<sup>6</sup> 常宝，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学民俗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艺术社会学。



## 一、关于知识精英话语权及其社会责任

随着知识在社会体系中核心地位的确立，作为知识的载体，“知识精英”在社会中的话语权和功能不断凸显，其社会责任有了新的界定和体现。知识精英首先是知识分子，在英语中，intellectual 有两层含义：一是知识分子，二是脑力劳动者，将两者相结合，可言为：知识精英是脑力劳动者，体力劳动是非知识精英，脑力和体力是界定和区分知识精英的最主要特征。

关于知识，关于知识精英的讨论在社会学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知识与符号、知识与权力之争成为知识社会学的重要议题。有人说，知识精英是真理的追随者和代表者，有人说知识精英是一群不负责任的“观念制造者”。知识与知识精英的权力，尤其是知识精英的话语权是其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功能的主要体现。真正的知识精英是什么样的一群人？他们代表着谁的利益和权力？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葛兰西（Gramsci Antonio）认为，真正的知识精英应该从社会关系的总体，即“既真实而又非中介的一种关系”中去界定。这就说明了知识精英所追求的目标和社会独立性人格特点，真正的知识精英应有其社会权力和责任感、使命感，应对社会变革与发展产生影响。

在西方，知识精英的诞生与知识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有关，进一步说，与西方社会所追求的自由、平等以及公民性密切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尤其在清末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千千万万知识精英处于特殊的国家命运和社会变革时期，他们强大的“国家梦”和社会责任感，成为那个时期中国知识精英的基本政治共识和社会意识。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进入当代后，知识精英的角色和社会功能发生了变化，大多数知识精英在错综复杂、形形色色的社会局面和权力、利益的博弈过程中逐渐疏失其政治共识和社会责任感，甚至很多知识精英“随大流走”或者选择沉默，默认、接受和承受着当前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与多元混杂的社会价值体系，出现知识精英的观念与行动不一致现象，知识精英疏失其独立人格和行动能力。就如格里德尔所说的那样：“早期几代知识分子坚定信奉的世界观的崩溃，维护传统秩序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腐败，对传统信仰形成了挑战，也使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职业机遇和社会责任感产生了危机感。”<sup>1</sup>

知识精英，作为社会杰出人群，在当代社会的演变与发展过程中比普通社会成员拥有更多的知识、文化与社会资源以及话语权、影响力，应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在社会的不公正、不和谐发展过程中，知识精英有义务站出来为社会公众和总体发展方向发声、呼吁，使其话语拥有权力，进而社会中，至少在民众内部产生反响和影响，为社会大众尽责，为广大底层人群增能，知识精英应发挥其身上的社会功能。

## 二、当代少数民族知识精英话语体系特点

包括蒙古族知识精英在内的当代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群体及其集团内部关系和外部联系是人们尚未研究和探讨的崭新领域。关于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定义，高永久等人认为：“民族知识精英是指在民族知识分子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威望、最有影响力，并能够左右民族社会思想潮流的一部分人，他们以传播知识和技术为业。”<sup>2</sup>

自古以来，由于民族或族裔文化、语言文字传播、使用范围的有限性，与主体民族精英相比，少数民族知识精英所拥有的知识话语权相对受限，但他们拥有的“这种话语权使其在民族文化重构中拥有了较之普通民众更强大的话语权力，他们的话语权对内有助于实现群体的自我认知和整

<sup>1</sup>[美]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他们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叙述》，单正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sup>2</sup>高永久、柳建文，“民族政治精英论”，《南开学报》2008年第5期。



体认同，对外则是他民族了解本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sup>1</sup> 因此，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话语权对族内认同、国家认同和不同民族之间的认同乃至民族关系影响颇深。

从传统社会发展到今天，蒙古民族社会有着清晰的社会分层及其演变过程，其中知识与知识精英扮演着独特的社会角色，拥有相应的社会责任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蒙古族知识精英的话语所表现的内容和形式截然不同。以民国时期为例，蒙古族精英郭道甫“长期致力于发展蒙古民族文化教育事业，以期推动蒙古民族意识之觉醒，实现蒙古民族的自觉、独立与解放。”<sup>2</sup> 那时期蒙古族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主要话语为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民族自觉”、“民族独立”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治理制度下中国各民族的话语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构成核心话语体系，包括蒙古族知识精英在内的少数民族精英群体在强大的国家意识和社会融合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普世性价值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在多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社会建设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进入新时期，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传统社会价值体系趋于解体和瓦解，大量少数民族人口加入了城市化的大潮流，知识精英在复杂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关系中开始反思和审视过去和当下，思考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民族地区现代化问题，考虑民族教育与人才培养问题。

近几十年以来，当代蒙古族知识精英所反思与思考的主题，并形成话语权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重构历史的“实时”话语。随着各民族的文化觉醒和反思，蒙古族知识精英也开始反思和审视其以往的历史，崇敬和仰慕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等蒙古首领征服天下、建立封建帝国的丰功伟绩，通过以往辉煌的历史记忆来重塑和重构民族文化。对民族历史的自豪感和荣誉感自然而然地成为当代蒙古族知识精英的话语体系，认为“蒙古帝国的特殊性在于它建立了世界史。蒙古帝国第一次开创了世界史”<sup>3</sup>，蒙古人的历史在当代社会文化建构中拥有了特殊、独特的话语权。

（二）注重实权实利的“自治”话语。“自治”一直是多民族国家与地区“永恒”的话题及其实践的焦点。“严格来说，民族自治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构建的衍生物或伴生物——多数民族（主体民族）建国后，为了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也为了平息或安抚与自己有着类似诉求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不能独立建国的少数民族。”<sup>4</sup> 当前，大部分蒙古族知识精英对中国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着天然的认同，但始终对自治制度的完备性有些疑惑，即民族地区区域自治制度多大程度上能够维护和保障民族精英和民众的权利和其资源支配能力问题。

（三）留恋传统的“现代”话语。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游牧、农业和工业是不同生产生活阶段，在不同时期民族社会中这几种生产方式交错出现，在蒙古社会不同地域生产生活方式中游牧似乎处于优先地位，游牧经济、游牧文化及生活方式成为人们追随和崇尚的生产类型，在知识精英的话语体系打造过程中成为重要“材料”和不可掩盖的“强音”，甚至在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中，大多数蒙古族知识精英的话语带有浓烈的留恋传统的情怀和丧失过往的悲情。

（四）优惠优先的“发展”话语。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社会中，不同民族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主体民族和非主体民族的社会地位、经济资源的拥有程度不同。由此，很多民族国家对少数、非主体民族实行“优惠”政策，以缩小群体差距，达到和谐发展、共同繁荣的社会目

<sup>1</sup> 方青云，“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精英意识与民族认同——以当代畲族文化重构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sup>2</sup> 冯建勇，“边疆民族精英的建国想象——以民国时期蒙疆藏为例”，《文化纵横》2014年第6期。

<sup>3</sup> [英]乌·额·宝力格(Uradyn E. Bulag)，“我的‘民族’，你的‘问题’”，伦敦政经中国发展社团网，<http://mp.weixin.qq.com/s/TN-1det3GaKRTgGOG3w5A>

<sup>4</sup> 周少青，“非均质化民族自治”——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自治问题的一种新范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



标。在国家优惠政策的作用下，民族地区很容易形成“优惠”的权力化倾向，包括蒙古族知识精英在内的民族成员认为，“优惠”是一种国家法律赋予的特殊权力，认为“优惠”是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

（五）民族优先的“世界”话语。“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几乎成为民族地区特色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一段座右铭。大多数少数民族知识精英认为，着力强调和重视本民族文化、本民族语言和本民族符号是一个民族走向世界、通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和行动理念。

母语是民族社会最有力的文化符号，母语的学习、传承与发展成为知识精英话语体系中的基石。大多数少数民族知识精英认为，学习和传承民族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过程，十分重视母语教学教育的重要性，并呼吁和主张用母语来接受现代文明和知识，鼓励增加和凸现民族文化符号，保护和抢救民族文化传统。

在民族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很多少数民族知识精英依然主张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在现代教育与社会知识的传播过程中拒绝和排斥外来文化，甚至无限扩大自身民族文化的潜力和影响力，将自身民族文化、经济类型和生产方式定位为“世界级”或者“人类最美”地位。

### 三、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困境：政治敏感、文化“俯视”与知识的“异化”

在大多数多民族国家中，政治的敏感性和偏激是不可逾越的难题，少数民族精英对政治有独特的敏感性。“近年来，人们将更多的关注焦点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身上，分析民族地区和民族群众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发展困境，但是，极少有人去关注民族地区的知识精英面对现代化时的矛盾和迷茫的心理。”<sup>1</sup>

（一）政治的敏感性是当代国家与民族、中央和地方关系中的张力的具体表现，也是少数民族知识精英产生困境的重要社会环境。进入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新时期，民族文化开始寻找其发展的方向和出路，其中少数民族知识精英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也是民族文化内涵、头脑和理性程度的代表者。“多语言”的少数民族知识精英是民族文化的翻译者、传播者，也是民族文化的封闭者和否定者。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封闭和否定其民族文化的具体表现为，以政治敏感性为借口的“沉默”和“无所事事”。例如，目前在新疆，“除了政府的官方报道以外，还有一些非维吾尔族的学者的声音，偶尔也会听到维吾尔族宗教人士的声音，唯独听不到或者极少听到维吾尔族知识精英的声音。他们是维吾尔族的榜样，他们是民族文化的引领者。目前，面对关系到自己民族切身利益和未来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却保持沉默。国际上、中国政府、学者和民众都无从知道他们的真实想法，仅仅是在猜测和揣摩。”<sup>2</sup>

少数民族知识精英“无所事事”的表现在于民族精英对有些话语有意识的规避和消极的参与、思考态度以及认知过程。

（二）在当代国家内部多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知识精英观念与行动困境出现在以文化差异为基础的民族关系的“文化俯视”性话语体系中。西方人早就从生理和体质的角度对世界民族进行优劣划分，从而西方人将自身放在优等、优秀的位置，“俯视”着其他民族与文化。在中国，各民族之间历史以来形成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关系连接着不同民族群体，不同民族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游牧、农耕、工商业社会经济类型之间的互补性特点造就了历史，创造了中华文明。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形成的差异、隔阂和成见一直延续至今，各民族在文化上都

年第5期。

<sup>1</sup> 赵茜，“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困境分析——以维吾尔族知识精英为例”，《宁夏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sup>2</sup> 赵茜，“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困境分析——以维吾尔族知识精英为例”，《宁夏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有“傲慢”和“自豪感”，认为自己的民族及其文化是最高级、最优秀，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油然而生。

进入现代社会，传统族裔和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辉煌和美好记忆不断被现代农耕与工业文明掩盖和替代，传统游牧、狩猎民族文化在现代工业文明中处于被动、劣势地位，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快速、高效、频繁的交流 and 互动模式冲淡了各民族-国家、不同文化群体、族群之间的边界和文化差异性，尤其对那些弱小民族和族群文化传统意义和价值体系带来了“除魔化”（disenchantment）、“世俗化”的冲击。现代性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与传统族裔文化之间形成了鲜明对照，区域社会文化丧失其原有功能，使得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文化前景产生忧虑。这种变化强烈地刺激和挑战了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在内的少数民族成员的反思性行为，他们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主体及其差异性嵌入到现代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将历史与当前、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甚至将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相互对立起来，“主体间性”在不同民族之间具备了崭新的意义，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少数族裔和民族虽然处于明显的被动、劣势地位，但他们的文化“傲慢”和“俯视”景象依然存在，他们主要用历史与环境主义不断重塑民族文化的形象。例如，蒙古族精英和民众常以成吉思汗时期辉煌的历史记忆作为文化自豪的中心，以游牧经济的环境理念作为抵触现代工业文明的有力武器，在强劲的现代文明中维护着自身民族文化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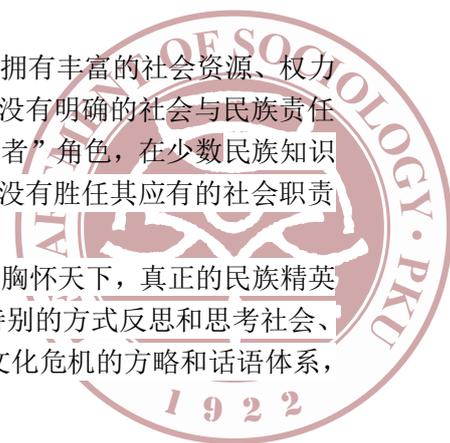
（三）与政治偏激和文化差异一样，知识的“异化”也是当代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重要困惑之一。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决定着其知识的视野和宽度，以传统专业体系和视野为内容的知识体系在现代全球性社会发展过程中难以掩盖其狭隘性，在科学、理性和实证的现代社会文化学术研究中很容易暴露其“感性”和“情感化”特征，其解释力被大打折扣。在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受教育过程中，本民族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历史和地理等专业代表着传统，他们往往以“感性”视角来解释和论述民族文化社会与经济的演变发展过程，对本民族语言文字与传统文学的情感性辩护、历史的寻根性论述，依然决定着他们的学术研究基调，因此很难适应和融入现代学术研究的前沿与主流，并导致了少数民族知识精英与外界难以对话的尴尬局面。

新型理性专业知识的出现，尤其是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开始接触和学习新型理性专业知识的局面打破了传统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知识框架，也推动了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内部的“异化”进程。在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学、社会工作、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民族学与生命工程等专业知识的扩散，使传统的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开始以另一种知识视野看待和审视自身民族文化社会的演变发展过程，进而在民族精英内部产生了持不同观点的，带着新型专业“光环”的特殊知识群体，甚至这些人被传统知识精英群体命名为“不热爱”、“不关心”民族文化社会发展的、被另一种外来专业知识“洗脑”和“异化”的“叛徒”。

#### 四、知识精英的使命：审视并指明民族文化与社会发展方向

如前所述，精英人士是民众的代言人，是社会中的佼佼者，他们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权力和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和使命。但是，当代大部分少数民族知识精英没有明确的社会与民族责任感，他们只扮演着充分利用民族身份、民族符号的老奸巨猾的“谋生者”角色，在少数民族知识精英中很难找到真正能够担当社会和民族责任的人，很多精英人士并没有胜任其应有的社会职责与使命。

知识精英在社会中应有不可推卸的使命感和责任心，身居陋室，胸怀天下，真正的民族精英不会为当前物质生活的艰苦、本民族文化的边缘化而忧伤，而是以特别的方式反思和思考社会、民族和整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危机，努力提出解决问题、化解社会文化危机的方略和话语体系，



从而影响和改变社会，甚至指明社会发展的方向。例如，很多少数民族知识精英不仅要强调使用母语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及培养能够使用母语的民族精英的重要性，同时也“需要指出本民族文字作为现代化知识载体的有限性”<sup>1</sup>，需要解释、论证和指明当代少数民族青年一代就业难、文化心理调适和未来发展的前景。“美国印第安人的处境被认为与精英的集体失声和无所作为有关，比如印第安人自己的学校在培养学生在白人社会的竞争力方面并无建树。”<sup>2</sup>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社会可以说是被遮蔽、忽视和陌生化的另一个世界，少数族裔和民族的生活状况，尤其是那些偏远边区的民族社会的生活、青年一代的教育和多民族社会关系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局面和情形。例如，在内蒙古广大农村牧区，由于农牧业生产无法与全国性市场对接和融入，玉米等农产品和羊肉、羊毛等牧业产品价格及其整个生产收入不断下降，土地、草场的制度性变革与自然性消耗，使得广大蒙古族农牧民的生计与生存面临极大危机。如何通过市场手段来开拓产品销路，如何以类似于合作社等集体力量改变农牧业产品在全国市场中的地位，如何提高农牧业产品的质量、打造品牌，如何保护农牧业生产的利益，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蒙古族知识精英们认真研究和思考。

在另外一个领域中，大量蒙古族青年大学生不断被专业选择单一、就业率低迷等现实情形困扰（如表1）。

表 1. 内蒙古自治区 2015 年蒙古语授课本科毕业生人数较多的 10 个专业

专业名称	前 10 个专业毕业生数(人)	前 10 位中的比例 (%)	毕业生总数中的比例 (%)	专业名称	前 10 个专业毕业生数(人)	前 10 位中的比例 (%)	毕业生总数中的比例 (%)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603	26.72	11.14	学前教育	166	7.35	3.07
蒙医学	310	13.74	5.73	动物科学	160	7.09	2.96
行政管理	222	9.84	4.10	思想政治教育	155	6.87	2.87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9	7.93	3.3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1	6.69	2.78
新闻学	172	7.62	3.12	护理学	139	6.16	2.57
总计					2257	100.00	41.70
2015 年蒙古语授课大学本科毕业生总数为 5412 人，毕业生人数较多的前 10 个专业人数为 2257 人，人数较多的前 10 个专业人数占毕业生总数的 4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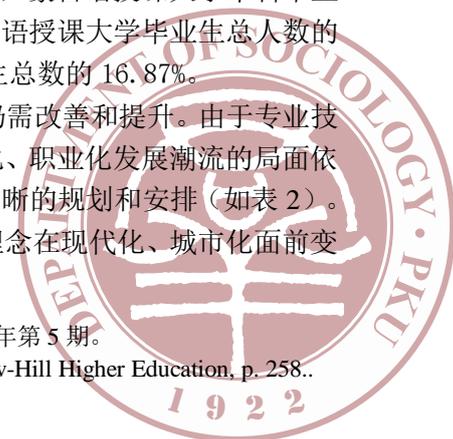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2016 年 1 月 18 日，《内蒙古自治区高校本科、专科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2015）》。

从表 1 所显示的专业顺序和结构看，蒙古族大学生在专业选择上仍囿于民族特性。而就业率较高、协议率在 80% 以上的专业如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工程管理、热能与动力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等，并不在蒙古语授课本科毕业生数较集中的专业之列。蒙古语授课的雕塑、播音与主持艺术以及长调表演、蒙医学都属于就业率较低的专业。2015 年，蒙古语授课大学本科毕业生共 5412 人，蒙古语授课本科毕业生人数较多的 10 个专业占蒙古语授课大学毕业生总人数的 41.70%，其中，蒙古语言文学、蒙医学这两个传统专业人数占毕业生总数的 16.87%。

由此可见，蒙古族大学本科生专业结构的多元化与就业竞争力仍需改善和提升。由于专业技能和现代性认同理念的缺乏，许多蒙古族大学生难以融入国家现代化、职业化发展潮流的局面依然在延续，一些大学生终日迷茫并无所事事，对自己未来职业没有清晰的规划和安排（如表 2）。他们所掌握的本民族语言文字、传统文化符号和生产技能以及价值理念在现代化、城市化面前变

<sup>1</sup> 马戎，“汉语的功能转型、语言学习与内地办学”，《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 年第 5 期。

<sup>2</sup> Richard T. Schaefer, ed. 2006. *Sociology: A Brief Introdu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p. 258..



得十分无力和不合时宜。因此，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文化格局，很多蒙古族大学生无所适从，在应当继续坚持、坚守和发扬传本民族文化传统，还是要努力学习和接受汉语文、外语和计算机等现代工具性课程内容方面产生迟疑甚至焦虑（如表3）。与此同时，在民族群体与个体发展问题上他们普遍产生了忧虑，在如何调整和糅合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与本民族文化传承之间出现了张力和矛盾。很多蒙古族大学生深刻感受到自己在融入现代化进程以及捍卫传统习俗、语言和技能所面临的局限性，进而在选择自我兴趣、专业学习、职业规划方面缺乏自信，表现出复杂多样的心理现象。

表 2. 蒙古族大学毕业生未来发展规划情况表

发展规划	从未规划过	尝试规划过，但不清晰	有清晰就业规划，并已开始实行
人数比例 (%)	65.2	31.3	3.5

资料来源：根据萨如拉硕士学位论文《蒙古族授课大学生就业现状及对策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2012年）对516名蒙古族大学毕业生进行的问卷调查相关资料整理而成。

表 3. 蒙古族大学毕业生未来发展规划情况表

工具性课程	汉语文掌握情况 (%)		外语学习情况 (%)		计算机学习情况 (%)	
成绩情况 分类及比例	成绩良好	13.4	成绩良好（英语）	16.0	成绩一般	62.5
	成绩一般	55.0	成绩良好（日语）	42.0	成绩良好	12.8
	成绩不好	31.6				

资料来源：根据萨如拉硕士学位论文《蒙古族授课大学生就业现状及对策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2012年）对516名蒙古族大学毕业生进行的问卷调查相关资料整理而成。

仔细观察当代蒙古族大学毕业生，由于地方性知识与现代知识体系之间、在本民族文化传统与普世性价值之间存在的隔阂和矛盾无法得到弥合和跨越，一部分蒙古族大学生们被卷入回到自己家乡的“潮流”，一部分大学生在都市的时尚与博弈中迷失自己，进而出现一批“游离者”群体，主动迎合现代化挑战，自由穿梭现代异文化社会的大学生极为少数（如下图）。这无疑知识人才的巨大浪费，也成为关涉到少数民族地区青年人就业发展前景问题的社会潜在的重大隐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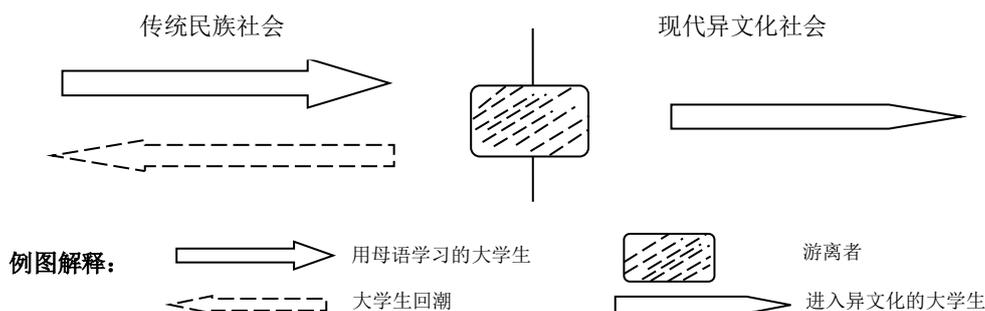


图 当代蒙古族大学生自我发展途径示意图

从本质上讲，大学是传授现代文明、糅合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的熔炉。进入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所学习和使用的工具性语言不可能单纯是本民族母语，大学校园的学习与生活过程就是一个不同阶层、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相互碰撞、对话和糅合的过程，也是这些大学生们学习承载现代知识体系的新词汇、新语言的过程，并是他们掌握新技术和新生活方式的系列实践。

学习本民族母语和国家通用语言的双语教育是少数民族精英成长与培养过程中的重要话语学习与实践，也是精英群体十分关注的一个敏感领域。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必须看到现代教育的基

本要求和人才市场的博弈规则，要研究和思考如何“两全其美、和谐发展”<sup>1</sup>的互动局面，要学会如何运用多种语言参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我们必须面对现今就业市场上对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结构，换言之，我们需要清楚地了解，今天的劳动力和人才市场对少数民族语言人才的需求规模究竟有多大。”<sup>2</sup> 我们不能一味、盲目、不负责任地推崇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要性，不得不关心、不思考当前少数民族文化、经济和青年精英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具体危机，更不应将青年一代当作民族文化的“挡箭牌”或“敢死队”，而自身却在民族符号的光环与护卫之下得利、谋求权力。那些只顾自身发展的少数民族知识精英是十分不称职的社会精英。

关于民族地区“区域自治”问题的讨论，也是当代少数民族知识精英话语体系中的关键词。随着全球性移民潮和大量流动人口的出现，传统民族-国家结构发生了变化，民族-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很难守住原有的疆界，“原住民地区”、“真正的自治”、“名副其实的自治”、“全面的自治”等话语不断丧失其实际权力、现实意义和文本合法性，并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由此造成少数民族知识精英话语与认同中的“非均质化的（多）民族国家与均质化的民族自治之间的巨大张力。”<sup>3</sup> 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必须站在现代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高度，充分研究、认知和理解当前民族政策、社会发展中的基本规律，并使之转化为相应的话语权。

#### 参考文献：

- [1] 马戎，汉语学习与中国少数民族的现代化，《社会政策研究》2017年第1期。
- [2] 马戎，汉语的功能转型、语言学习与内地办学，《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 [3] 赵茜，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困境分析——以维吾尔族知识精英为例，《宁夏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 [4] 周少青，“非均质化民族自治”——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自治问题的一种新范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5期。
- [5] 方青云，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精英意识与民族认同——以当代畲族文化重构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 [6] [美] 格里德尔著，《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他们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叙述》，单正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 [7] 高永久、柳建文，民族政治精英论，《南开学报》2008年第5期。
- [8] 戴庆厦，两全其美，和谐发展——解决少数民族双语问题的最佳模式，《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 [9] 《内蒙古自治区高校本科、专科 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2015）》，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2016年1月18日。
- [10] 萨如拉，《蒙古语授课大学生就业现状及对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2012年。
- [11] Richard T. Schaefer, ed. 2006. *Sociology: A Brief Introdu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

<sup>1</sup> 戴庆厦，两全其美，和谐发展——解决少数民族双语问题的最佳模式，《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sup>2</sup> 马戎，汉语学习与中国少数民族的现代化，《社会政策研究》，2017年，第1期。

<sup>3</sup> 周少青，“非均质化民族自治”——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自治问题的一种新范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5期。

